

孙大千 编著

天津经济史话



天津经济史话

孙大千 编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天津宝坻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2插页 238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册

ISBN7-80563-002-X/F·004

定 价: 3.00 元

前 言

天津从历史上就是我国北方的货物集散地。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被开辟为商埠，从此，天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同时，李鸿章在天津创办洋务运动，与帝国主义进一步相结合，所以，洋务运动的过程，又是天津半殖民地加深的过程。但是，帝国主义以及洋务运动所创办的企业，也为天津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一些客观条件和良好基础。再加以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使天津的经济日益繁荣，工商业、银行业、货栈业、交通运输业等相当发达，俨然成为北方一个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这本《天津经济史话》就是从一些侧面介绍了天津解放前经济发展的概况。因为，该书是通俗性的读物，不是有关经济史的专门性学术著作，只能使广大读者能够了解到解放前天津一些有代表性的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梗概，以及它们的特点和由来，以便借鉴其精华，为天津“四化”建设和城市改革服务。

为编写这本《史话》，我学习了有关历史资料和史学界一些同志的著作和文章，从中受到不少启发和帮助。从而，激励

我读书疾笔，一气呵成。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天津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由于有些资料是第二手的，是别人整理的成果，引用时没有一一注明出处。加以我的学识浅薄，水平有限，《史话》中有些事实和观点可能有值得商榷和探讨的地方，有的可能是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1986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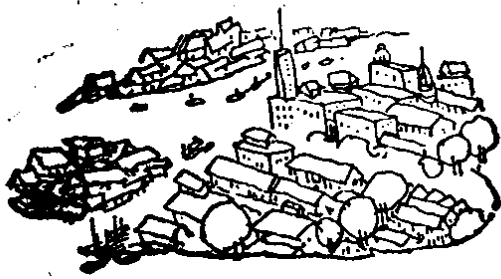
目 录

前言

沧海桑田话天津·····	(1)
海河的演变·····	(14)
长芦盐务·····	(17)
漕运与天后宫·····	(23)
解放前的城市建筑·····	(27)
昔日的城市园林·····	(35)
居间盘剥的牙行·····	(43)
残酷野蛮的封建把头——天津的脚行·····	(48)
天津“八大家”的兴衰·····	(54)
天津早期的桥梁建设·····	(63)
天津钱业的兴起·····	(69)
久盛不衰的正兴德茶叶庄·····	(74)
天津最早的粮栈——怡和斗店·····	(79)
官办军火工业——天津机器局·····	(83)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天津租界地·····	(88)
旧天津海关·····	(107)
天津怡和洋行及买办梁炎卿·····	(112)

全国最早的电报与铁路·····	(117)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	(121)
天津外商银行·····	(125)
城市公用事业的变迁·····	(135)
城乡物资交流的纽带——天津货栈业·····	(144)
三条石·····	(151)
天津早期的商业中心·····	(155)
天津保险业·····	(162)
“三不管”的今昔·····	(169)
天津商会始末·····	(174)
官银号·····	(184)
天津英美烟公司的经济垄断·····	(191)
周学熙与北洋实业·····	(196)
英美三大石油公司的经济掠夺·····	(210)
名扬津城的“八大祥”之一	
——天津瑞蚨祥绸缎庄·····	(216)
闻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庄·····	(223)
天津地毯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227)
解放前的天津汽车洋行·····	(232)
爱国实业家宋则久与天津国货售品所·····	(237)
艰苦创业的久大盐业公司·····	(244)
为国争光的永利制碱公司·····	(249)
功在中华的实业家——范旭东·····	(254)
卓越的化工大师——侯德榜·····	(260)
著名的化工企业家——李烛尘·····	(263)
天津六大纱厂·····	(268)

天津北方航业公司的兴衰·····	(274)
驰名中外体坛的利生体育用品厂·····	(279)
天津证券市场的兴起和消亡·····	(284)
天津劝业商场的变迁·····	(288)
天津中原公司的兴衰·····	(293)
“冒险家乐园”里的宠儿——骗子李亚溥与利华	
大楼的崛起·····	(298)
解放前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303)
陈调甫与永明油漆厂·····	(312)
朱继圣与天津仁立实业公司·····	(317)
宋槩卿与天津东亚企业公司·····	(324)
天兴制铁所——天津第一家轧钢厂·····	(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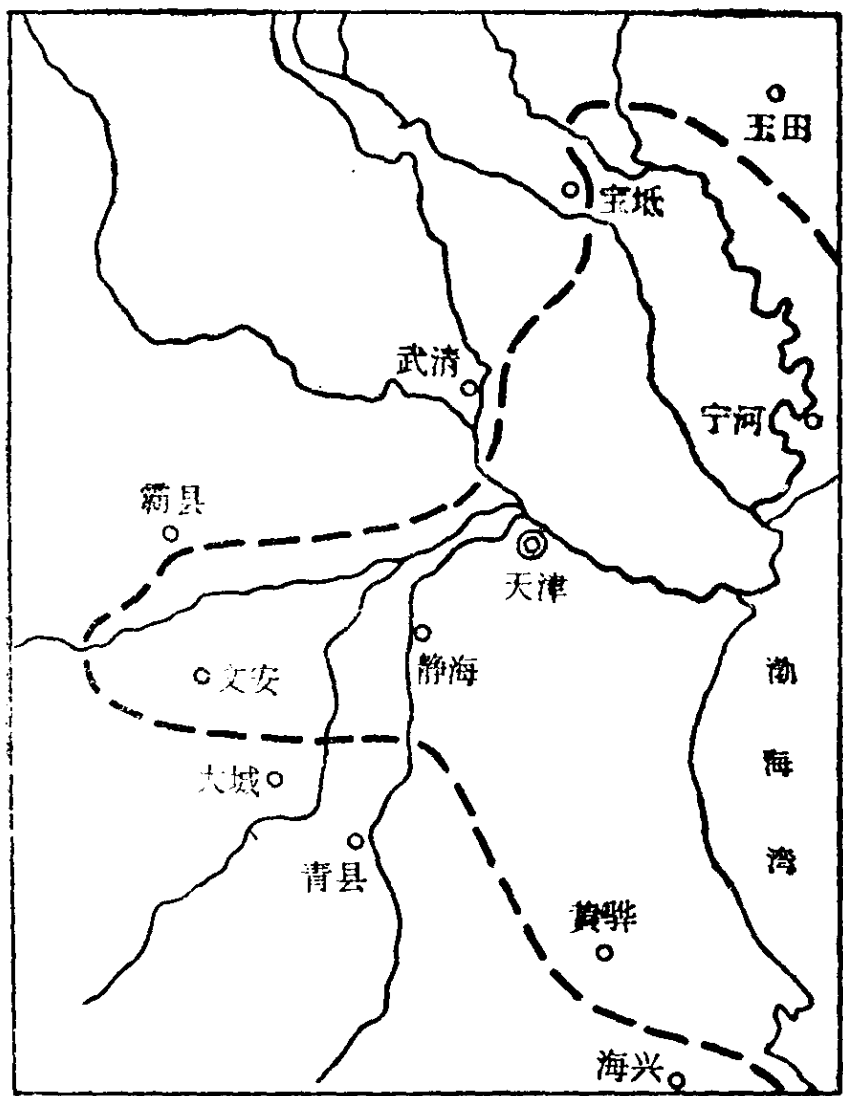
沧海桑田话天津

(一) 早期的天津

天津是我国首都的门户，华北的经济中心，有悠久的历史。追溯天津的历史，首先遇到的是天津平原的成陆问题，因为作为人类活动的舞台，必须以是否成陆为前提。据解放后多年来的实地考察以及钻探资料得知，华北沿海大规模的海退、海侵（海退、海侵，主要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当气温降低，地球上出现巨大冰川的时候，海洋贮水量减少，海面随之降低，海岸线退缩，浅海地带成为陆地，是为海退；当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面随之升高，侵入沿海陆地的现象，叫做海侵，桑田成为沧海。），至少发生过六次之多。天津平原在一万年前开始的海侵中成为海洋，南至黄骅，北及宝坻，西至白洋淀附近，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是属于渤海的组成部分。到距今四千年时，天津平原自张贵庄以西开始为陆地，这个年代正接近夏代。海侵结束，海面回降到基本接近现代海面的高度。天津平原上的海生动物遗骸就是在这个时候留下来的。这次海侵

发生在我国新石器时期，称作全新世海侵，或称冰后期海侵（参见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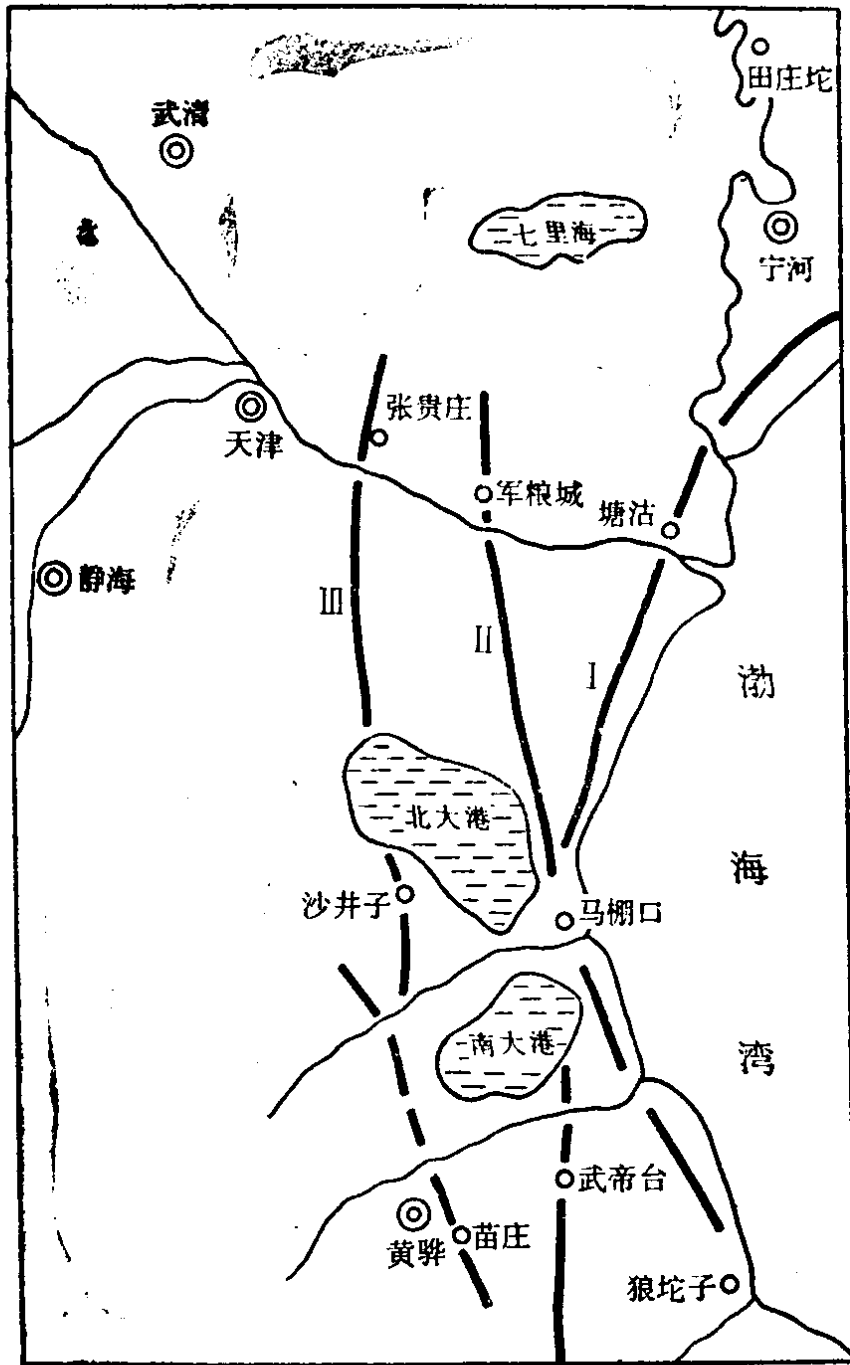
全新世海侵范围示意图



（图一）

天津平原成陆以后，多是沼泽地带，河流洼淀，纵横交错。早期的居民点，多在地或贝壳堤上（参见图二）。贝壳堤就是海岸的遗迹（贝壳堤是海岸线移动的记录，是陆地向海伸展的脚印。贝壳堤在天津境内有三道：第一道在海边，北起汉

天津境内贝壳堤分布图



(图二)

沽，经塘沽，到南部马棚口入黄骅县。这条贝壳堤形成的年代，天津境内为明、清以前，黄骅县境内为唐宋以前；第二道

北起东郊白沙岭，经军粮城、泥沽、上古林，到马棚口与第一道重合，形成年代是在战国以前，最早年龄是距今二千五百三十年（泥沽），最晚是距今一千四百六十年（白沙岭）；第三道北起东郊张贵庄，经巨葛庄、沙井子到窦庄，最早年龄是距今三千八百八十年（张贵庄），最晚是距今三千零四十年。〕，近年来在它的上面发现许多战国、汉、唐遗址和古墓。天津最早的居民就是蓟县围坊村（位于蓟县城东五里）的居民。正当天津平原还是碧波万顷，鱼虾畅游的时候，他们就在峰峦起伏的燕山之阳，开始餐风宿露，披荆斩棘，从事艰苦的开发事业了。燕山之阳相传是黄帝氏族的活动范围，那时候在此附近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战争，即黄帝和蚩尤于“涿鹿之阿”的战争。

天津周围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较早的有磁山文化，分布在太行山区，距今约有七千年的历史。稍晚一些的是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分布在燕山南北，距今约有五六千年。再晚一些的是龙山文化，北京、唐山等地都有发现，天津发现于宝坻县牛道口村，年代约在四千年以前。红山文化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种地方文化，分布在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由于红山文化和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故曾和仰韶文化一起被称为“彩陶文化”。由此可见燕山南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国初期，天津平原属燕国，战国末期，齐国进入天津平原，双方在军事角逐中彼此削弱，赵国又乘虚而入，几乎攫取了整个滨海平原。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赵国的好梦不长，未经几年，燕、齐、赵三国皆为秦国所灭。

天津平原经过战国时期二百多年的开发，引起了西汉王朝的重视，沿渤海湾西岸接连设置了5个县治，作为开放平原的

基地，这便是渔阳郡的泉州、雍奴，渤海郡的文安、东平舒、章武。天津地区，当分属于上述诸县。泉州故城位于武清县城上村北，雍奴故城位于武清县旧城东八里的丘古庄，其他各县均位于今河北省地区。城，最初是为抵挡洪水而兴建的，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成了统治者聚居的堡垒。所以，《释名》云：“城，盛也，盛受国都也”。在饱含财富的渤海湾西岸，一座座城池巍然屹立，象征着西汉王朝对这个地区的开发和统治。汉末，曹操为了消灭豪强袁绍残余势力及征讨乌桓，便于军运，在天津一带开凿了一条运河，名叫泉州渠。

根据历史记载，约在西汉末至东汉后期，渤海湾西岸曾发生过大海侵，村落废弃，县治内迁，欣欣向荣的开发进程被迫中断，一切又回到了接近原始海岸的荒凉状态。天津历史的发展进程出现重大的曲折。因此，东汉以后长达四百年之久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人口稀疏，经济落后，直到隋、唐时期，局面才有显著改变。

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征调河北诸郡100多万人，开凿了南接沁水（位于河南），北达涿郡（现北京市）的永济渠（又称御河，即今卫运河），对当时天津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唐中叶以后，天津不仅是内河漕运的枢纽，又成为南方运进大米、绸缎的海口。现在东郊区的军粮城就是唐代海运物资的重要港口。今天在军粮城发掘的唐代遗址墓葬，都是唐代海运时留下来的，军粮城的名字就是由唐代在此转运军粮而命名的。

北宋时代，宋、辽的分界线就在天津地区，海河就是当时的“界河”。宋朝为了防辽，曾在沿岸设置了许多“寨”“铺”

等军事据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泥沽寨，双港寨等；同时，还在界河以南，利用塘泊与洼淀，造成一道“深不可舟行，浅不可以徒步，虽有劲兵，不能渡也”的防线，以防卫辽兵南下。宋朝势力衰弱，害怕南北人民的交往，用重刑予以禁止，但仍然阻止不了人民的交易往来。泥沽海口是商船和渔船出入的门户。辽人由海口载盐入界河，到内地贩卖，南方福建、海南一带，商船也从海上到界河与辽人贸易。由此可见，当时天津地区在军事和交通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金元时代的天津

从金、元时代起，天津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天津最早的名称“直沽寨”出现在金代。其位置约在三岔河口一带，即今狮子林桥附近。金朝晚期受蒙古威胁很大，他们为了保持与其发源地东北地区的联系，控制住交通孔道，对直沽寨特别重视，经常设重兵把守。

进入元代，天津地区的盐务和漕运，均有很大的发展，天津地区有了明显的变化。公元1234年（元太宗六年）秋，人民开始在三汉沽、大直沽一带煮盐。《新校天津卫志》王鹗著《三汉沽创立盐场旧碑》曾载：“甲午之秋，三汉之地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或经日自生，……招徕者日益重，河路通便，商贩往来，是年办课五百锭”。可见这一带不仅是设灶煮盐之地，也是当时漕运的重要枢纽。两年后，元王朝正式设官“监造”，产量很大。盐利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垂涎，不久为权势把持，灶户工本亏损，盐民生活甚为困苦，但盐商却十分豪富。

元朝幅员辽阔，支出浩繁。自公元1267年建都大都（今北京市）后，“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不得不组织更大规模的漕运，依靠南方各省供应，河运、陆运劳费很大。公元1282年（元至元十九年）试行海运成功后，运量年增，年达三四百万石。大量的粮食经过直沽中转到大都，直沽的地位日益重要。元朝设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专管这一地带的屯守事宜，设立“接运厅”专管海运漕运。在元人诗句中有“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之句，描绘了当时的漕运发达景象。公元1316年（元延祐三年）改直沽寨为海津镇。

（三） 明清时代的天津

天津名称始于明代。天津的得名，是镇守北方的燕王朱棣为和他的侄子惠帝争夺皇位，于公元1400年（明建文二年）率军由直沽渡河南下，即帝位后，将直沽改名天津，即是“天子经由之渡口”的意思。当时的渡口在北门外一带，曾建有“龙飞渡辟坊”，现已荡然无存。不过天津城市的发展，不在于明成祖朱棣的赐名，而在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畿辅通志》上对天津有这样一段描述：“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官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俨然一大都会也。”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概括。天津在漕运和海运中兴起，经济日趋繁荣，就是因为天津的地位控制着我国北方沿海海陆交通枢纽的缘故。公元1404—1406年（明永乐二年至四年），明王朝把西从海河以南，沿南

运河至山东德州卫，东到渤海沿岸的一片土地，划为一个军事区域，先后设置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负责从天津到德州间的漕运、屯田、戍守、巡捕等事务。

公元1405年（明永乐三年）又令工部尚书黄福在三岔河口西南建筑天津卫城，天津三卫衙门都设在城里。据《天津卫志》记载，新筑的天津城，“城垣九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开设四门，名称分别是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四门皆有城楼，城墙外为壕，其中北门正对渡口，经常有朝廷命使往来，修筑得最为讲究。以后，北门外又开始形成繁华的商业区。筑城设卫是天津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

明代的天津，以直沽（三岔河口附近）和大直沽一带最为繁华。直沽的繁华区在城外东、北两面的沿河一带，东北角有永乐年间重修的天后宫，万历年间修建的玉皇阁等。由于元朝建都北京以后，直至明、清，每年都有大量的漕粮（官粮）经天津转运。为此，在天津的商业中粮商居多，北门外“开设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通京师。”“天津无沃田，人皆以贾趋利”，反映了商业在明代天津经济中的比重。城东的宫南、宫北大街，城北的锅店街、针市街、估衣街、竹竿巷，以及牛行、驴市、布店胡同等，都是早期商业的遗址。随着海运事业的兴起，天津城的北门和东门外，还出现洋货街，公元1824年（清道光四年）有人写诗描写洋货街：“百宝都从海泊来，玻璃大镜比门排，和兰琐伏（疑即沙发）西番锦，怪怪奇奇洋货街。”可见，天津的国际贸易也开始发达起来。由于商业的发展，金融业也逐渐发达起来。在宫北大街有兑换钱银的银市。钱商还发行银票、钱票在市面流通。到18世纪末，在天津出现全国最早的经营汇兑业的“票庄”，开始是山西人开设的日升

昌颜料铺，经营天津、四川的汇兑，获利很大。后来在天津的山西各行店群起仿效，山西票号到19世纪末还有很大势力。

由于天津经济日趋繁荣，位置亦显重要，公元1725年（清雍正三年）天津卫改为州，隶属河间府，把原来的军事区划改为行政区划。后又将天津升为直隶州，统辖武清、青县、静海三县（清代的州有两种：散州和直隶州。散州和县一样，隶属于府，府隶属于省；直隶州直属于省，并有自己的直辖州境，又有下属的县）。公元1731年（清雍正九年），天津由州改为府，下属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和沧州等六县一州。还有许多重要的清政府派出机构也设在天津，诸如水师营、长芦巡盐御史、钞关（税收衙门）等。于是天津冠盖云集，成为官僚、富豪麋集之地。许多大官僚、大盐商在天津营建邸宅园林，显赫一时。

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国家陆续侵入中国，中国逐渐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天津也由封建城市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当时天津地区约有人口44万，城区约有20万人。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武装侵入天津，清政府先后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外，又增加了天津开埠等条款。帝国主义者开始实现他们立足渤海滩头，控制中国首都，侵入中国北方内地的野心。

天津开埠以后，清政府又派媚外的崇厚为三口通商大臣常驻天津，管理天津、牛庄、登州通商事务（当时，天津开埠时的人口约有30万左右）英、法、美侵略者，胁迫崇厚划天津城南之紫竹林沿河一带为三国租界，这就成为侵略者掠夺中国北

方的根据地，于是，外国的商人、政客、流氓、投机分子、传教士大批涌至，银行资本也接踵而来。他们不仅操纵贸易，并且还代表其本国政府与清政府进行借款活动，发行钞票，经营存放款，来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汗。1860年（清咸丰十年）到1867年（清同治六年）间，各国在天津设立的洋行17家，到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则增至47家，不少洋人在天津成了暴发户。而且，英、法、美帝国主义在天津设立领事馆，控制了海关。如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 Detring）先后控制海关达20余年之久，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不但控制海关，并勾结洋务买办推销军火，掠夺工矿，甚至成为卖国贼李鸿章外交政策的主要策划者。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春，由于天津人民不堪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天津开始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后来，英、俄、德、法、美、日、意、奥等组成八国联军，派出军舰集结大沽口外，发动侵华战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当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乘机向中国大量输入资本，强占土地，增设和扩展天津租界，帝国主义的银行、工厂、洋行骤增。他们雇用一些无耻的中国败类，作为掠夺原料和推销商品的工具。因此，天津也出现了买办阶级。天津的买办最初是洋人由广州、宁波带来的，即所谓“广东帮”与“宁波帮”。后来又在本地产培养出一些。天津早期最著名的有所谓“四大买办”，即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华俄道胜银行兼泰来洋行买办王铭槐与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即吴调卿）。他们不仅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帮凶，又成为拥资数百万的富翁。